

艰难修远的求学之路

——读《海轮西去》

· 桑士显 ·

历史发展到本世纪初，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刚刚平息，清洲皇室的宝座刚刚被掀翻，按理，中国人该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生存环境了。可谁料定，继之而来的军阀之间的大交战，军阀之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各军阀为了争夺地盘，各寻一帝国主义国家为靠山，帝国主义也趁火打劫，支持军阀打内战，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的出路在哪里？那些怀有对国家、对民族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开始思索。思索的结果是：向西方学习，学习西人的工业、农业技术，民主政治、科学精神……于是“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大地上，知识界掀起了一股求学于欧西的留学热潮，湖南省华容县罗喜闻、何长工、高风等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加入了几千名赴西洋留学的留学生行列。为了纪念他们，学习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求索的精神，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该时代知识分子西渡求学的时代条件以及他们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命运，为当代又一次的“世界大串连”提供有益的启示，华容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符哲文、严文田二同志主编了《海轮西去》一书。

或许因为华容赴法勤工俭学的十几位青年学生个个家境贫寒，或许因为湘省不愿意出资公派，或许是比此更多的原因，华容学生在赴法求学的过程中比其它诸省的留学生付出了更大、更重的代

价。《华工西去》生动翔实地记述的这一切，读后使人感慨万端，潸然泪下。

出国前，他们奔波于广州、长沙、上海，达3年有余。为筹款，吴让周、高风等惨遭华容知县夏逢时的枪击与逮捕。为筹款，罗喜闻步行数千里，穿过军阀交织成的枪林弹雨，去郴州向革命军首领乞求资助；为筹款，在北京多次奔走于熊希龄、章士钊、杨怀中等湘籍人士之门，要求帮助。为出国，在长辛店铁路一家工厂里何长工、罗喜闻等不怕吃苦，同工人一起劳动，同时于此学习法文；为出国，罗喜闻从北京步行千里去河南探听法人招收华工消息；为出国，在上海同法国买办——华法教育会上海分会的负责人发生冲突……他们太艰难了，寒冬腊月，北风呼啸、雪花飘飘，在长辛店边做工，边学习的几位同学竟没有一人能穿上棉衣，后得湘人胡子靖资助100元，并让他们派一人去取，可他们却无一人能够走出门，因为这几位无棉衣穿的学生只能天天缩在被窝里度日子。最后他们都把衣服脱下，让罗喜闻一人穿上去京取来，可他们几个人搜破口袋也找不出买车票的1角5分钱，喜闻只得一人“劳动两腿，昌风走一遭”（罗喜闻《艰难的跋涉》）。重重困难，没有撼动他们西去求学的坚强意志，在多方的支持下，他们终于克服困难，于1921年底，乘法轮“智利”号飘洋西去了，并于次年初到达法国。

如果说，这几位青年在国内为求学奔走呼号比较难的话，那么，到了国外，生活上的艰难程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20年代初期的

的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战争给法国尤其法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到处是炮火留下的累累伤痕。工厂倒闭，工人大批失业，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法国本土工人要找工作极端不易，更何况这些外来的俭学生？在求工不成，俭学无望的情况下，这些怀着赤诚报国之心青年学生陷入了艰难的困境。何长工说：“我天天半夜起床，先到市场上推蔬菜，送牛奶上门。天亮后，就到火车站去上货，卸货，给人搬行李，抱小孩。最累的是在工地当临时工，搬砖推瓦扛水泥，打扫工地，清扫马粪、垃圾，一天工作完了，腰酸臂痛……”（《难忘的岁月》）。罗喜闻说：“我初入厂的工作是：用大锤将刚出模的铁轮上面的缝隙锤平。做了一个星期的锤工，身体实在难以支持，晚上睡觉，遍身筋骨酸痛难忍，翻身转侧，极为费力。每夜略略入睡，即又痛醒，次日还要忍痛去干”。（《艰难的跋涉》）。他们还曾经为了摆脱困境，到拉马西煤矿当矿工，“每天在洞中躬腰驼背来来往往行走六七小时，却有些难挨，加上空气又不充足，在里面也窒闷得慌”。（同上）。华容青年生活困苦如此，其它留法学生也如此。本书作者谈及了几件令人心酸的往事。罗喜闻说，当时福建有一留法生，多日未见茶饭，实在饿极了，他想出一法。即当他看见一法国警察朝他走来，他急忙把脚伸入河里，做自杀状，法国警察见状问由后，掏出了5个法郎。何长工说：他在圣雪尔旺公学读书时，有许多留法生，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只得到乡下农场里找活做，这些学生见了地主老爷还得脱

帽行礼，连地主婆坐马车过此也得行礼，否则即被解雇（引同上）
罗喜闻还说：“那时巴黎各工厂每日开门时必有许多勤工俭学生形同乞丐，挟着一套工衣，鹄立门前，仰候看门人的鼻息……然而等到开门，看门人用右手一挥，大家便只得无精打采地散了”／（同上）。这些学生受到如此难平的侮辱，可他们挺过来了，因为要生存只能如此，要求学只能如此，要振兴中华，只能如此，谁让我中华经济、科学、文化落后于他邦？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贫困并不能撼动他们的意志。因为传承下来的士人安贫的“孔颜乐处”（李泽厚语），一直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但他们却无法忍受精神上的打击。当时的留法学生在精神上所受的打击使他们十分痛心。当时这批留学生抛家离舍，怀着满腔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强烈愿望，克服重重困难，赴西洋留学，而换来的却是国内各种不同人物的责骂、阻挠、甚至血的镇压。在这里，有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陈篆的责骂，“什么勤工俭学，完全是闹党，他们在国内闹得不够，现在闹往国外去了”（《艰难的跋涉》），国内报刊多附和此说，就连提倡并热情支持中国学子出洋求学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也如斯观。华容留法学生同其它各省留法学生到了法国后，在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情况下，在法的华法教育会便停发了学生的生活维持费，这些学生在异国他乡度日如年。恰好蔡元培先生来法，他们象盼到了救星一样，哪晓得他“到巴黎后，却深居简出，不与勤工俭学生见面，专听一班官费生的造谣污蔑，把勤工俭学生说成是‘土匪流氓’”，“后来蔡先生不知听了谁的话，还

向国内发一个电报，说什么：“勤工俭学生既无勤工之能，又无俭学之志，实不堪造就”，“勤工俭学生处在万分困苦之中，眼巴巴地望着蔡先生解倒悬之厄，不料他不但不如此，反而将倒悬的绳索拧得更紧、更急”（《艰难的跋涉》）。更有甚者，北洋军阀驻法公使陈篆，竟把占领中国在法庚子赔款办的里昂大学的俭学生用武力关进法国的兵营，并于1921年10月13日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张昆弟等104名学生，“层层围住，开来大汽车数辆，将同学点名上车，每车以兵警4人荷枪实弹押送（同上），迫使他们回国。在这一事件中有不少死亡，留学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要求报国与报国无门的痛苦，使本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他们在充满荆棘和泥泞的道路中探寻，有的像邓小平、陈毅、蔡和森、李立三、何长工等选择了砸烂旧的国家机器，通过革命的手段，解放受难的劳苦大众的道路。有的选择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但事实上证明了此路不通。有的选择了国家主义，并为之不懈地奋斗，可没曾想，却走入了与人民所选择而且应该选择的革命道路相反的路径。……这批知识分子艰难而又修远的求学之路以及后来截然不同的选择，从正反两个方面给当代知识分子以有益的启示，值得深长思之。

作者简介：桑士显，《海轮西去》责任编辑。1962年11月生，1987年毕业于华中师大历史系，获硕士学位。围绕知识分子问题发表论文数篇，并参加写作过一些著作，如《历代名君评传》、《中国文化历史手册》等。现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文科编辑室编辑。

罗喜闻与湖南留法勤工俭学

符 哲 文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现代革命史初篇中的一件大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湖南，是当时全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¹⁾；湖南留法学生，在全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除了历史与现实的因素以及赞助者如李石曾、熊希龄、范源杰等的作用外，与毛泽东、蔡和森等的积极倡导与组织是分不开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但是，在研究这一页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特别指出，在倡导者和组织者的名单中，还有一个人，——一个鲜为人知的人，他的名字也是不容忽视的。他，就是罗喜闻。

罗喜闻，名承鼎，湖南华容县人，1888年生，1909年毕业于湖南西路师范学堂。1914年至1917年间，因愤恨当时国内军阀横行、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残酷现实，曾出走上海、广州、南洋等地，寻找出路。1917年10月起，他即投入当时风行一时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并为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竭力发起组织，奔走呼号，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1) 恩来《勤工俭学在法最后之运命》，原载1921年12月20号天津《益世报》。文中所列人数总计为1579人，其中最多的四川、湖南、广东，分别为378、346、251人。

中国，这个伟大而又贫弱的国家，怎样才能得救？这是鸦片战争以后国内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苦心焦虑的问题。但是，实践证明，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主张，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都无法改变祖国落后的现状。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封建专制，而民主共和的希望，转瞬间就在人民心中破灭，仅余“民国”的幌子在民族危亡的凄风苦雨中飘荡。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随之而起的欧洲革命的风雷，才给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带来了民族解放的希望。于是，五四前后，在中国大地上，知识界掀起了一股出洋深造，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的求学热潮。于是，由李石曾、蔡元培等发起组织的留法俭学会、华法教育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和留法预备学校或预备班，亦同时应运而生。

因此，当罗喜闻于1917年10月在广州织布机厂分销所门前看到了《留法勤工俭学会章程》及《说明书》后，便欣喜若狂，并立即往见广东留法俭学分会干事黄强，要求进广东留法预校学习。时因广东军事正急，无暇筹备预校，黄强写信叫罗去北京找北京华法教育会负责人蔡元培、李石曾。罗喜闻自广东乐昌步行千里到长沙，不意适逢广西谭皓明率护法之师与北军吴佩孚部相持于岳阳一带，南北交通阻塞，罗喜闻只得将黄强的介绍信邮寄北京李石曾，居留长沙待命，并将从广州带回的《留法勤工俭学会章程》及《说明书》向长沙各校散发。一时要求赴法的青年学生甚多，罗喜闻的

住处门庭若市。

月余，李石曾复信罗喜闻说：“如湘省人数众多，可与湘教育会商议，……凡需本会协助之处，当竭力赞助”云云。罗即持函见湖南教育会会长陈凤荒。陈以“大兵驻省，经费、校舍均难设法”为词婉加拒绝。罗又拟去南县组织预校，虽有数十人愿意从行，但终因经费维艰而止。(1)

1918年3月军阀张敬尧占领长沙，去北京的道路已通，原来经由罗喜闻组织的预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数十人，因避战祸，早已风流云散。罗便同所邀集的同乡青年戴勋、段振寰、周楚善、高风等一行5人毅然赴北京找到李石曾，由李帮助租房自炊并暂入北京大学法文夜班听课。李石曾、蔡元培嘱罗喜闻可约集60名湖南学生来京，以专开预校湖南班。

这年6月25日，湖南第一师范学生蔡和森到北京，通过北大教授杨怀中的介绍往见李石曾，为新民学会成员谋求赴法勤工俭学。李石曾即派人将其引至罗喜闻住所，嘱蔡找罗接洽。后罗、蔡商定各约30名左右湖南学生来京，以开办湖南班。于是，罗、蔡分途发函。于是，才得有这年7月罗喜闻所邀集的熊世麟（即熊今悟）、何坤（即何长工）、蔡支华、高尚、吴让周等30余人的抵京和鲁其昌等14人的自上海来到，以及3月19日蔡和森邀集的新民学

(1)引自《留法勤工俭学会湖南会员记事录》，原载《勤工俭学报告书》，1920年华法教育会广东分会刊印。

会会员毛泽东、李维汉、萧三、罗章龙等12人和湖南同乡13人的抵达。于是，湖南班遂有70多人，而“留法之形体遂具”。⁽¹⁾

以上是罗喜闻发起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的大致情况。那么，新民学会发起、组织留法的活动究竟始于何时？这里有必要补叙一下。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自民国七年四月十七日⁽²⁾学会成立至这年八月，四个月中，有两件可记的事：一、加入新会友。……二、发起留法运动。此事以前尚有人发起，没有成。至是长沙方面之最初发起者，为蔡和森与萧子升。时子升在楚怡任课，和森就居楚怡日夕筹议。何叔衡、毛润芝、陈赞周等时复加入讨论。是时其他会友亦有几人行将外出，遂于6月尽间，在第一师附属小学陈赞周、萧子升处（陈萧在此任课）开一会议。……自此，留法一事，和森和子升专负进行之责。不久，和森赴京。”⁽³⁾报告中所说关于留法运动，“此事以前尚有人发起，没有成”，即指罗喜闻1917年底至1918年初受阻于长沙时，商请湖南教育会长陈凤荒未获允准和罗拟邀集同乡赴法未成之事，而此时新民学会尚未成立。

作为新民学会会员的李维汉，在他后来《回忆新民学会》的文章中，则说得更为明白。他说：“新民学会成立后，会员深感向外寻求新思想、新文化的必要。1918年6月，在长沙第一师范附

(1)同上页注。此处所记人数系指“湖南班”最初开办之人数。

(2)按萧三日记记载，应为4月14日。

(3)见《新民学会资料》第4—5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

小召开的一次会员会上，确定进行留法运动由萧子升和蔡和森负责进行。在此之前，已有湖南学生罗喜闻等在进行留法的活动，互通一些消息。新民学会的这次会后不久，蔡和森受学会委托赴北京和蔡元培、李石曾联系赴法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则进行号召和组织工作。”⁽¹⁾

这些材料，都明白无误地说明：罗喜闻发起和组织留法求学的活动早于新民学会；因此，他是湖南留法勤工俭学最早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二

前文已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在我们的祖国和民族濒临危亡关头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没有交上好运；而湖南的情况，则更其特别。这不仅是因为参加赴法的青年绝大多数出自贫寒之家，而且因为湖南的主政军阀忙于争权夺利，不愿意出资援助，当然，还有其它更多的原因。要不是几位发起者和组织者的竭尽全力，尤其是罗喜闻的奔走呼号，湖南（至少是湖南的部分学生）的赴法勤工俭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湖南班”成立后，湖南同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即是经费问题，不但预习生活要开支，更主要的是出国留学需要一笔巨款。因此，筹款即是摆在罗喜闻等人面前的首要任务。可是当时的湘省政府却有

(1)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

闲心照顾这些小之又小的穷酸学生？而北京政府的政客们又怎会白白地为他们出国求学拿出钱来？同此，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双腿四处奔跑，乞怜告哀。为了筹款，罗喜闻同北京同学推举出的代表罗喜春、李实等频频求助于湖南旅京人士章士钊、熊希龄、胡子靖、范源濂等人（罗喜闻说，由于屡屡碰壁，“那两位代表则有点厌烦，不愿意跑，有时就叫我一人跑”）。为了筹款，他从北京到长沙，又从长沙起程，赤脚草鞋，冒着北风大雪，在一片“拜年”声中（时值农历正月初四）往返步行千余里，穿过军阀交织成的枪林弹雨去郴州向护法军友人求助；为了筹款，他从“广东奔到北京，整整奔波了两年，向人作哀乞怜的信，如果印刷出来足有一厚本”，⁽¹⁾他不知磨破了多少嘴唇皮、踏破了多少草鞋，而最后竟“几乎与夷齐为伍”。⁽²⁾为了出国，他往返千里赴河南任丘探听法人招收华工的信息；为了出国，他与不识时务的华容知县夏逢时闹到对质省署，状诉报端；为了出国，他甚至不惜家破人亡：妻子得了神经病，子女每人离下当了“小长工”⁽³⁾……

罗喜闻是大艰苦了，他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假如他不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全体湖南同学，他尽可以利用自己最早的组织者身份，利用各种多样的关系和机会而较早地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出国愿望，又何必要吃这么多的苦，受这样大的罪，而历尽艰辛两三载？

(1)见罗喜闻《艰难的跋涉》，载《海轮西去》第21页，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见上书第19至23页。

(3)见罗康余《献给父亲的小花》，载《海轮西去》第96页。

当“湖南班”成立之初，即面临着人满为患的困难处境。因为当时预校只有保定育德中学尚有一个能容四五十人的教室，而湖南来京同学却有80余人。按照李石曾的意思，是要优先安排最早来京的罗喜闻等人去保定。罗喜闻见蔡和森提出了他们想去保定的要求，遂主动带领7名华容同乡到了条件最为艰苦的长辛店铁路工厂预校。在那里，他们每天做6小时工、上4小时课，艰苦备尝。

“湖南班”成立之后，各处留法预备班同学均各一边学习，一边忙于筹款出国，而罗喜闻等此时亦正在长辛店饱受辛酸之难。正是在这种紧要关头，罗喜闻得到了章士钊先生在上海同乡处为其筹集的千元捐款。这对于罗喜闻来说，实在是无异于雪中送炭，久旱逢甘霖。可他却主动提出按所有湖南同学平分这笔款项，最后还是蔡和森坚持说长辛店同学最苦，应该多分点，他才拿了140元回长辛店。

从1919年底开始，北京、保定、长辛店三处湖南班同学能自备船费的即已陆续西渡赴法，不能自备船费的除一部分改弦易辙另谋出路外，其大部分如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等40余人亦已由李石曾、熊希龄等向设在上海的湖南善后协会借得贷款，于次年5月9日首途赴法。而罗喜闻最早奔走呼号南北，历尽艰辛三载，直至湖南赴法同学全部成行，自己才搭上西渡赴法的末班轮船。

因此，罗喜闻不仅是湖南赴法勤工俭学最早的发起者，组织者，而且是最得力的组织者之一。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暂且不作回

答。但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却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1920年12月15日，是我们奔走呼号了两三年才得着最后安慰的一天，又是我们在生于斯、长于斯的父母之邦烦闷抑郁了几十年，暂时与她作一个短暂离别的一天。假使我们自己的工业、教育发达，我们班穷学生尽可在祖国勤工俭学，何必远涉重洋，将劳力贡献给外国资本家？想到这里，又不免发生无限感慨！”⁽¹⁾

三

1921年1月21日，罗喜闻等到达法国首都巴黎。他们会合了早先到达法国的湖南同学，一道投入了饱经忧患的勤工俭学生活。直到这时，即在身临其境之后，他们才知道法国的现状与自己在国内的想象是多么不同。原来，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法国和法国人民留下了巨大的战争创伤和灾难，工厂大量倒闭，工人大批失业，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法国政府深深陷入一方面要应付要饭吃的大量失业工人，另一方面还要应付要求安插工作的从战场上下来的上百万退伍士兵的困难处境，又哪能顾及到这些外来的留法勤工俭学生？这就使这些留法勤工俭学生落入了“工尚难求，遑言俭学”的旋涡。

自1920年开始，勤工俭学生中的大多数人不得不靠领取留法教育会发给的每天5法郎的“维持费”过活，而罗喜闻因不愿领那“不名誉的维持费”（罗喜闻语）也只得和一部分湖南同学（包

⁽¹⁾罗喜闻《艰难的跋涉》，载《海轮西去》第25页。

括当时年纪最大的徐特立先生)一道投入了中国“马老伍”(法语“粗工”的中译音为“马勒伍尔”,中国学生戏呼之为“马老伍”)的行列。他先是应戴勋之邀到法国北方欲做打扫战场的苦工,因觅工无着,即入菲尔米克火车轮工厂捶铁轮,推大件。一段时间后,又同吴让周、段振寰、王导潜等同去拉马西煤矿挖煤。因受过伤,害过病,无力干重活,后便转到巴黎万花酒楼洗碗碟,到针织厂编花边。罗喜闻的工作是很苦的。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几段描述:

“我初入厂的工作是,用大铁锤将刚出模的铁轮上面的缝隙捶平。做了一星期的锤工,身体实在难于支持,晚上睡觉,通身筋骨酸痛难忍,翻身转侧,极为费力。每晚略略入睡即又痛醒,次日还是忍痛去干。”⁽¹⁾在拉马西煤矿,“每天在洞中躬腰驼背来往行走六七十小时,却有些难挨;加上空气又不充足,在里面也窒闷得慌。”⁽²⁾至于万花酒楼的工作,则是“每天早起升4个煤炉的火,削二三十斤马铃薯,洗几十斤蔬菜、二三百只盘碟、几百只叉勺……”此外还须“加汤换水、递送油盐、切肉宰鸡,放这样、拿那样,忙得两脚不着地”,每天“足有15小时的工作,终日在地窖电灯之下,从未见过天日。”⁽³⁾但是,在法国,随着罢工、倒闭、退工、转产等社会变故的更迭发生,即使这样的工作,也不是容易找得着的。罗喜闻说,“那时巴黎各工厂每日开门时,必有许多勤工俭学生形

(1)见《海轮西去》第33页。

(2)见上书第35页。

(3)见上书第53页。

同乞丐，挟着一套工衣，鹄立门前，仰候着门人的鼻息。我便是其中之一。然而等到开门，看门的用右手一挥，大家便又只得无精打采地散了。”他的工作如何苦法？由此，我们即可窥见一斑。

不仅罗喜闻是这样干的，由他所组织带领同去法国的湖南华容——湖南留法学生最多的县——的12位同乡学生也都是这样干的：戴勋、熊世麟在丹格尔克当过清扫战场的苦工；毛遇顺在机械厂做过杂役，后又到柏尔富的多勒弗史纺织厂当过学徒；周楚善在克鲁邹捶过铁件；高风在巴黎编过纸花和花边；何长工在巴黎市场上推过蔬菜、送过牛奶，在建筑工地上拌过水泥、捶过石块……何长工说：“我天天半夜起床，先到市场去推蔬菜上市，送牛奶上门。天亮后，就到火车站去上货、卸货，给人搬行李、抱小孩。最累的是在工地当临时工，搬砖推瓦扛水泥，打扫工地，清扫马粪垃圾。一天工作完了，腰酸背痛……。”⁽¹⁾

其实，在法国，凡属有市镇，有工厂的地方，都有过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手泽”（罗喜闻语），都有过中国“马老伍”的足迹。罗学赞、鲁其昌在法国南部的克鲁邹工厂做过工；李富春、李维汉在法国西北部的哈 弗尔造船厂做过工；张昆弟、任理等在圣伯尼工厂做过工；……不过，在这一群中国湖南的“马老伍”队伍中，比起其他人来，罗喜闻干“马老伍”的时间更长，受苦也更甚。他直到1924年回国才结束这“只勤工而末俭学的生活”／

(1)见何长工《难忘的岁月》，载《海轮西去》第84页。

(罗喜闻语)。而对此，罗喜闻曾说：“我心中愚忖，千辛万苦来到法国，除替法国资本家做了几年奴隶外，可谓一无所得，这样跑回去，实在不甘心……。”⁽¹⁾的确，他又怎么能甘心呢！

四

广大勤工俭学生是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一美好愿望而赴法求学的。但是，无情的现实，却使他们的理想很快化为泡影。勤工俭学生们不仅饱经法国战后经济危机的威胁，而且饱受国内军阀、政客的谩骂与要挟。国内反对派们轻的说什么勤工俭学生“不堪造就”，重的则骂他们为“过激派”，“闹党”，甚至勾结法国当局以停发“维持费”，遣送回国相胁迫。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勤工俭学生不得被迫作出反应，于是爆发了1921年著名的“三大斗争”，即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二八运动”、“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八·一三事件”（又称“爱国拒款运动”）和抢占里昂中国大学（简称“里大”）的斗争。湖南留法学生蔡和森等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其中的两次（第一次与第三次）斗争⁽²⁾，而罗喜闻因为刚到及伤病等原因未能参加前两次运动，但他始终关注着这些运动的进展，并积极参加了影响更大的第三次斗争。

由于“二八运动”和“爱国拒款运动”的发生，极大的触犯了中法反动当权者的利益，于是中法监护旅法中国青年委员会（简称

(1)见《海轮西去》第64页。

(2)见李维双《回忆与研究》（上）第20页。

“监护委员会”）悍然宣布停发维持费，并扬言要将全部勤工俭学生分批遣送回国。而与此同时，又传来了原为勤工俭学生筹建的里昂中国大学也突然抛弃了勤工俭学生而在国内另招新生的消息。于是，以蔡和森、赵世炎等为首的勤工俭学生奋起反击，他们迅速成立联合委员会，并组成先发队，投入抢占里大的斗争。可是，当以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为主体的“世界工学社”和赵世炎领导的“劳动学会”成员为骨干组成的先发队125名勤工俭学生到达里大时，不意遭到了中法反动当局的无理拘捕，他们以“无钱无学革命党”的罪名，用武力将全体先发队同学押送于芒特吕克炮台兵营关禁起来。

为了营救被押居兵营的赴里大先发队同学，罗喜闻从遥远偏僻的拉马西煤矿只身赶赴里昂，居留里昂十多天，多次入监与被关押同学共同谋划应变大计。他多方奔走呼吁，广泛联络学友，争取社会舆论，并用《觉社》名义发出通告传单，揭露中法反动派蓄意摧残教育、迫害勤工俭学生的黑幕，给狱中同学以有力声援。为了营救在押同学代表赵世炎，罗喜闻巧施心计，获取驻法副领事李骏签署的“准许罗承鼎（即罗喜闻）等二人进兵营看朋友”的名片，单身入监，待铁^门换岗后，径携赵世炎逃出兵营，使赵世炎得以脱险，并使其得以与周恩来等一道为以后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作出巨大贡献。

抢占里大的斗争，虽然以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群~~、贺果等／